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全文收录期刊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年第4期 (总第40期)

■ 阎学通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 外交改革课题组

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

■ 崔立如

中国外交面临命运共同体中的竞争

■ 贾庆国

中国外交改革创新任重而道远

■ 山本美智子
张 玮

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的量化分析

■ 徐秀军

学科史视域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清华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Institut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 2014 年. 第 4 期/阎学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97 - 6756 - 6

I. ①国… II. ①阎… III. ①国际政治 - 丛刊 IV. ①D5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2141 号

国际政治科学 (2014 年第 4 期)

主 编 / 阎学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756 - 6

定 价 / 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政治科学

2014年第4期（总第40期）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文正仁（延世大学）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

布 赞（Barry Buzan，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田中明彦（东京大学）

石之瑜（台湾大学）

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牛津大学）

托（William Tow，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

张睿壮（南开大学）

沈丁立（复旦大学）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普林斯顿大学）

埃文斯（Paul Evans，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贾庆国（北京大学）

猪口孝（日本中央大学）

萨 尼（Varun Sahni，尼赫鲁大学）

阎学通（清华大学）

彭佩尔（T. J. Pempl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编委会：

主 编：阎学通

副 主 编：陈 琪

执行主编：漆海霞

组稿编辑：孙学峰 刘 丰 徐 进 李 巍

评审编辑：周方银 马燕冰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斋304室

邮政编码：100084

电 话：010-62798183 62786457

传 真：010-62773173

电子信箱：CJIP@mail.tsinghua.edu.cn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1 |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 阎学通 |
| 36 | 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机制 | 外交改革课题组 |
| 64 | 中国外交面临命运共同体中的竞争 | 崔立如 |
| 69 | 中国外交改革创新任重而道远 | 贾庆国 |
| 74 | 冷战后中日政经关系的量化分析 | 山本美智子 |
| | | 张 玮 |
| 111 | 学科史视域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 徐秀军 |
-

146 2014 年匿名评阅人名单

147 2014 年全年总目录

149 注释体例

155 征稿启事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阎学通◎

【内容提要】 自2012年以来，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注定会失败。但是通过观察过去两年中国对外关系的成果，本文认为，中国改善了而非恶化了与他国的关系。与“韬光养晦”战略相比，“奋发有为”战略对于塑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更加卓有成效。笔者用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了奋发有为战略的作用，认为道义可以同时提高崛起大国的国际政治实力和政治合法性。韬光养晦战略与奋发有为战略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注重经济利益，后者强调政治支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奋发有为战略注重道义，而韬光养晦战略忽视道义。由于战略目标的不同，奋发有为战略在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上都有别于韬光养晦战略。到目前为止，奋发有为战略所取得的外交成绩已超出2012年时人们对习近平的期待。习近平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或许会成为阐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最佳和最新事例。

【关键词】 韬光养晦 奋发有为 道义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电子信箱：yanxt@tsinghua.edu.cn。

不论是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的关系而言，2010年都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

* 本文原载于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 年第 2 期。

《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4 期（总第 40 期），第 1—35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一年, 中国与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这使得中国国内关于邓小平于 1990—1991 年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是否还有必要坚持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① 事实上, 该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年。2013 年 10 月 24 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正式提出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② 标志着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战略性转变。讲话发布之后, 很多中外学者都质疑: 与韬光养晦战略相比, 奋发有为战略是否可以为中国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因此, 本文将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 讨论奋发有为战略对塑造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的作用。

一 支持韬光养晦战略的理由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国内没有人质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 但当时国际上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试图把该战略解释为中国隐藏其真实力量以争取复仇时间的缓兵之计。2002 年,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质疑韬光养晦战略的有效性, 认为该战略是邓小平为中国应对 90 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提出来的, 并不适用于 21 世纪的中国。^③ 但在当时, 坚持韬光养晦战略依然是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 其依然强调该战略在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 with 坚持的必要性。^④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Junichiro Koizumi)

①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新闻网, 2010 年 12 月 7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2-07/2704985.shtml>。

② 钱彤:《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版。2013 年 10 月 24—25 日, 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了这次外交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是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决策方面的最高级别会议。2006 年之前, 中国政府只举行驻外大使会议, 由主席或总理向参加会议的大使和外交机构负责人讲话。2006 年的外交工作会议是第一次由省级地方官员同政府机构负责人一起参加的外交会议,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 但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并未出席会议。

③ 叶自成:《关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再谈中国的大国外交心态》,《太平洋学报》2002 年第 1 期, 第 62—66 页。

④ 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 第 13—17 页。

自 2001 年上台后，每年都参拜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激化中日矛盾，批判韬光养晦战略的势头因此上涨。^① 令人疑惑的是，尽管中国国内的批评逐渐增多，国外却出现了越来越多支持这一战略的声音，甚至还包括那些曾经将韬光养晦战略视为“阴谋”的人士。从总体上看，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大多数中国人是支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即使在习主席将中国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奋发有为之后，中国国内仍然存在坚定支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强大力量。

（一）政界的解释

中国政界有很多人士认为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一些资深外交官将韬光养晦战略视作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一位外交官称，韬光养晦至少还要管 100 年，因为中国依然很弱，中国崛起的道路还很漫长。^②

中国政府高层最后一次对韬光养晦战略的解释，是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在 201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如果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将无法保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政治环境。在文章中，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内涵被概括为“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相一致”。^③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同志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先提出来的。^④ “不当头”和“不扛旗”，意味着中国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权，避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与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确立的、始终未受到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产生零和竞争，以防止美国集中力量遏制中国崛起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不扩张”和“不称

① 何宗强：《我外交新哲学：世界调整有利中国 韬光养晦应坚持》，《21 世纪环球报道》2003 年 1 月 2 日，<http://news.sohu.com/73/53/news205415373.shtml>；邢悦、张冀兵：《“韬光养晦”战略再思考——兼论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观察》2006 年第 6 期，第 13—19 页。

② 吴庆才、李静：《吴建民述中国外交 60 年变化：韬光养晦仍要管 100 年》，中国新闻网，2009 年 6 月 1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6-01/1713676.shtml>。

③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新闻网，2010 年 12 月 7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2-07/2704985.shtml>。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2—1992）》，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第 350 页。

霸”，意味着其他国家将无须害怕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胡锦涛主席执政期间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与“和平发展”这两点。值得注意的是，为减少对韬光养晦战略的负面理解，“谦虚谨慎”特意被放在了其他几个词之前。

国内政界对韬光养晦战略的上述解释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我国于 2008 年举办北京奥运会之后，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指责中国的“不作为”是“不负责任”。它们把“不当头”理解为中国拒绝参与与自身无关的国际安全事务，认为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不愿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第二，2010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拟在东亚制衡中国。据此，人们认为韬光养晦战略并不能防止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第三，2009 年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再次发生海洋权益争端，进一步表明韬光养晦战略无法安抚邻国。上述事实说明，韬光养晦战略已无法再为中国提供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官方将韬光养晦解释为“谦虚谨慎”，也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们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韬光养晦战略的效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放弃该战略面临巨大的困难。

（二）国内学界的辩护

韬光养晦战略过去一直得到中国多数学者的大力支持，如今该战略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上所述，2010 年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同一年，中日两国就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引发海上领土争端，日本政府扣押了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中国渔船。这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是否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激烈争论。2011 年年底，《环球时报》发起了关于韬光养晦战略的公开辩论。^① 面对中美、中日之间日益紧张的国

^① 《专家激辩“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不排除武力反击侵犯》，环球网，2011 年 11 月 17 日，<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1-12/2273974.html>。

家关系，中国仍有很多学者坚定地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为韬光养晦战略辩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多年来一直强调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属于典型的建构主义，重视中国文化的作用，而不注重物质实力的作用。^①

除秦亚青外，2011—2012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学学者也认为应当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这三所高校是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我国最早建立国际政治专业的大学。在2012年教育部的全国政治学学科评估中，它们分列前三。^②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认为，中国目前实力强大只是表象，实际上仍很弱小，因此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战略。^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认为，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韬光养晦战略也应是一个长期的战略。^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也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因为这个战略有助于改善外部条件，帮助中国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⑤

上述学者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但他们给出的理由却十分相似。即，中国的实力弱于美国，应该坚持韬光养晦，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然而，这种观点存在重大缺陷。自1990年以来，韬光养晦战略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方针，常量是无法解释中美之间起伏不断的关系变化的。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经历过多次危机，如1993年“银河”号

① 周兆军：《专访秦亚青：十七大后中国外交将更重视多边舞台》，人民网，2007年10月21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9/6369987.html>；王昭：《强硬或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利》，搜狐网，2013年1月1日，<http://roll.sohu.com/20130101/n362170348.shtml>。

② 中国教育部学位中心：《学科评估高校排名：0302 政治学（2012年）》，新浪网，2013年1月29日，<http://edu.sina.com.cn/kaoyan/2013-01-29/1112370365.shtml>。

③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页。

④ 沈丁立：《在〈环球时报〉年会上的讲话》，360doc个人图书馆，2012年1月14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14/11/3163972_179318980.shtml。

⑤ 金灿荣：《成熟的大国是理性的——斗智斗勇不斗气》，人民网，2012年9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917/c40531-19025384-1.html>。

货船事件、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以及 2009 年中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对抗等。这些事件表明, 即使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战略, 美国也无意放弃对中国的对抗政策。2010 年奥巴马采取的对华“再平衡”战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三) 国际上的支持

自 2010 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战略。20 世纪 90 年代, 很多国外学者认为韬光养晦战略是中国的“阴谋”, 那时中国的硬实力比 2010 年前后要弱得多。2010 年 7 月,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 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进行对抗性交锋之后, 国外学者开始指责中国的政策强硬 (assertive), 并建议中国不要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就连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也认为中国应延续韬光养晦战略。他说: “邻国害怕中国崛起, 所以要挑战中国。如果我可以向中国领导人建言, 我会建议他们谨慎, 要继续韬光养晦。中国有时间, 不要声音太大。”^① 他直言: “只要中国越来越强大, 无论它怎么做, 都不可能与他国建立更好的关系。”^②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国外学者的矛盾看法。一方面, 他们指责韬光养晦战略是中国政府设计出来隐藏实力的一个“阴谋”; 另一方面, 他们又批评中国用积极进取的政策取代韬光养晦战略。^③ 事实是, 无论中国坚持还是抛弃韬光养晦战略, 大多数国外战略分析家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冷战后的中国崛起视为一种威胁。很显然, 国外学者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 2010 年后中国采取了比 20 世纪 90 年代更加进取的外交政策

① 阎学通、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共识网, 2013 年 11 月 5 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zlwj/article_2013110594793.html。

② 阎学通、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③ David Pelling, “No One is Immune from Beijing’s ‘Gravity Machin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1, 2013, <http://www.ft.com/intl/comment/columnists/davidpilling>.

后，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反而大为改善。2013年，中国强化了与除日本、菲律宾之外的大多数邻国的关系，这说明上述观点是解释不了这一新现象的。2013年12月，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政策。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告之：“安倍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①这意味着只要安倍还在执政，中国领导人将不会同日本领导人会晤。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中日外交争端，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积极结果，即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不仅西方媒体批评日本，就连日本最主要的盟友美国政府也命令其驻东京大使馆发出正式声明，表达对日本政府的“失望”。^②美国政府如此立场鲜明地表达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按照韬光养晦战略支持者的逻辑，中国采取这一战略应当能够阻止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如果对日政策强势则会促使美日关系紧密，从而使得美国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故此，我们需要解释这种理论预期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不一致。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韬光养晦战略在新时代的实际作用以及它与奋发有为战略是什么关系。

二 理论框架

自习近平主席将中国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调整为奋发有为之后，许多国外国际关系学学者对这次战略调整的结果做出了不同预测。然而，这些预测未能充分考虑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两种战略各自产生的国际环境，也没有分析它们对世界政治的战略影响有何不同。要搞清楚这两种战略究竟

① “FM: Abe Shut Door on Dialogue with China,” January 7, 2014,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video/2014-01/07/c_133024577.htm.

② Takashi Oshima, “U. S. Expresses Disappointment at Abe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The Asahi Shimbun*, December 27, 2013,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312270048.

哪一个能够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两极化趋势中的崛起提供更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需要明确它们各自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将以道义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重点分析奋发有为战略给中美、中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

(一) 道义现实主义: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本文的分析基于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假定:第一,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的自然属性,安全困境不可避免。由于一国对自身与他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十分敏感,因此,在两极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世界第二大国难以隐藏其实力。第二,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而国际权力是大国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一国的国际地位决定该国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对第二大国来说,要制衡头号强国,增加战略盟友比获取经济利益更加重要。第三,权力竞争是零和博弈,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当兼并战略不可用时,战略竞争将转向获得更多的盟友。

本文的假设是,与韬光养晦战略相比,奋发有为战略能够吸引更多的盟友,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大国崛起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建立起基于自身的可靠战略信誉的国际领导力。如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提供安全保护和经济利益,它将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国际战略信誉。韬光养晦战略只着眼于通过经济合作带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奋发有为战略则旨在通过让他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来结交更多的战略伙伴。因此,奋发有为战略更有助于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战略目标。

本文将首先分析韬光养晦战略和奋发有为战略的差异,然后评估二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很难精确地界定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从哪一天开始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的。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在此之前已经参与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2012 年 2 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时首次提出中美应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

关系”。^① 同年7月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习近平发表了关于中国安全政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② 新型大国关系和共赢的理念成为他提出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当年有三篇重要文件全面地阐述了奋发有为战略，一篇是外交部部长王毅7月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演讲，一篇是国务委员杨洁篪8月发表在《求是》期刊上的文章，一篇是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习主席关于周边外交工作的讲话。习主席讲话中提出的奋发有为，从逻辑和语义上都与韬光养晦没有关系。笔者并非主张以习主席的讲话作为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的标志，但认为这次讲话为中国的外交转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要理解奋发有为战略的内涵，就需要认真分析解读上述三份文件。

笔者首先将辨析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的区别，然后用4个案例来检验本文的假设。这4个案例分别是2012—2013年的中美关系、中国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2012年2月，习主席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因此，本文将用2012—2013年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检测奋发有为战略的影响，用2000—2011年的双边关系来检测韬光养晦战略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两种战略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结构性矛盾中维持双边关系稳定的有效性。中欧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奋发有为战略在巩固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的战略合作中发挥的作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奋发有为战略在降低实力相对较弱国家对崛起国家的恐惧方面的效果。中日关系的案例将用来检验奋发有为战略和中日关

① 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人民网，2012年2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7137277.html>。

② Xi Jinping, “Work Together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o. 5, 2013, p. 3.

系恶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将对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做定量分析,分析所引用的中外关系数据选自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数据库。遗憾的是,该数据库目前还未包含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数据。因此,本文只能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做定性分析。

(二) 战略信誉与国际道义

笔者认为,中国建立国际战略信誉是为民族复兴塑造更好国际环境的关键性因素。在过去的 20 年里,韬光养晦战略成功地为中国的发展而非民族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1992—2011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0.02% 提高到 10%,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①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并未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战略朋友,也未能帮助中国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国际战略信誉基础之上的正面国家形象,中国将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因此,为了创造有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强调战略信誉的奋发有为战略显得非常重要。

战略信誉是低层次的国际道德。荀子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② 根据荀子的观点,一国要获得被他国认可的国际领导权,最低要求是要有战略信誉。一些学者称笔者是道义现实主义者,因为笔者认为,除非施行王道战略,中国将在提升国际领导力的战略竞争中无法胜过美国。^③ 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不应该考虑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可能的确如此,但对于古典理论主义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之父”汉斯·摩根索

① 参见 <http://unctadstat.unctad.org>。

② 孙安邦、马银华译注:《荀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第 115 页。

③ Zhang Feng,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 96.

(Hans J. Morgenthau) 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中, 就有两项与道德相关。在摩根索最广为人知的《国家间的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 有专门章节讨论国际道德。在书中, 他提醒人们, 国际道德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有可能会因不良动机被错误地利用。^① 他还提醒读者, 关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个极端: 一个是过高估计伦理道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另一个是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会受物质权力之外的其他考虑的驱使。^②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 国际道德是美国自称的或者是被摩根索定义为“假装遵守的”或“声称应当遵守的”道德规则,^③ 所以他认为, 当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更多道德考虑时, 其他国家会觉得中国更具威胁性。与米尔斯海默和摩根索所说的那种“假道义”不同, 本文中的“战略信誉”和“王道”两个术语是指国际社会实践的道德规范, 而非那些用来掩盖军事侵略的假道义。与自由主义通过军事实力对外输出民主和自由贸易等意识形态不同, 道义现实主义遵循“来而不拒, 不往教之”的信条。^④ 毫无疑问, 将一种意识形态或道德强加于人时,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但是, 当道义成为一种自律原则时, 冲突将不会发生, 取而代之的将是形成文明规范。道义现实主义认为, 采取自律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好的道德形象, 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国际支持。针对中国所倡导的国际道义原则, 习主席告诫外交工作者们, “这些理念, 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⑤

尽管古典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认为道义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影响, 但也认为两者有三点不同: 第一,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道义的作用在于保护人类的生命, 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道义还有助于增强政策的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7th edition.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240.

③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④ 出自《礼记·曲礼》: “礼闻取于人, 不闻取人, 礼闻来学, 不闻往教。”

⑤ 钱彤: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合法性和国家实力。^① 有关国际道义的这两种作用将在下文继续讨论。第二,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 如果外交政策遵循国际道义, 事实上会牺牲国家利益。而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 有道义的外交政策将有利于崛起大国获得战略利益。^② 崛起国的最高战略利益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如果崛起国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违背国际道义, 其崛起目标将无法实现。第三, 古典现实主义认定民族主义缺乏人道主义, 而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 在“有天下”思想的指导下, 民族主义的王道政策仍可以是人道的。^③ 王道是中国古代关于最高层次的世界领导权的政治理念, 它建立在物质实力和道义两者之上。^④ 道义现实主义用现代语言将王道归纳为公平、正义和文明三个原则。^⑤

(三) 权力与实力

为理解道义在奋发有为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需要区分政治权力和物质实力的含义有何不同。本文中的“权力”指的是一国对他国行为的影响力, 这与摩根索的定义相近。^⑥ “实力”指的是国家能力的组成要素, 该定义与摩根索书中“国家权力的要素”相近。^⑦ 在语言学上, 英文中的“power”有几种含义, 包括“拥有控制力、权威和影响力”, “行动的能力、物质的力量、精神或道德的效力”。^⑧ 摩根索用“power”一词交替表达“影响力”和“能力”两个含义, 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惑。在汉语中, “权力”和“实力”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词语, 没有英文中因“影响

①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241 - 247.

②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244.

③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259.

④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6 - 88.

⑤ Yan Xuetong, “New Values for New International Norms,”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3, pp. 15 - 28.

⑥ Yan Xuetong, “New Values for New International Norms,” pp. 30, 113.

⑦ Yan Xuetong, “New Values for New International Norms,” pp. 122 - 162.

⑧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 G. & C Merriam Company, 1977), p. 902.

力”和“能力”都用“power”而容易混淆的弊端。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权力”与“实力”这两个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常常被混淆。

在分析韬光养晦战略和奋发有为战略时，为了避免混淆，本文将“权力”作为实施外交政策的目标，将“实力”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在国家实力的组成要素中，政治领导力是关键因素，而它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道义的影响。荀子认为，王道是最高层次的世界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是以强国领导者的道德为基础的。^①

遵循国际道义可以使一国的行为合法化，并由此增强该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与缺乏道义的国家相比，一个讲道义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盟友和国际支持。总体而言，当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获得国际支持而不是经济利益时，这种政策就会重视道义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奋发有为战略提出了“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两个概念的原因，它们最早出现在2013年6月王毅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国将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②自此，“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演讲和文件之中。

（四）民族复兴与联盟

笔者认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理念导致了奋发有为战略的提出。习主席指出，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最高的战略目标。^③实现民族复兴的字面含义是指恢复中国在唐朝（公元618—907年）贞观时期（公元627—649年）的那种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历史地位，现在则特指中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防影响力上赶超美国。当中国政府把实现民族复兴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86–88.

^② Wang Yi, “Exploring the Path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o. 5, 2013, p. 19.

^③ Kristie Lu Stout, “Is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a Fantasy?” July 17, 2013, <http://edition.cnn.com/2013/05/26/world/asia/chinese-dream-xi-jinping/index.html>.